

温州“城中村”“精英”生成的微观考察

王 新

(温州大学法政学院, 浙江温州 325035)

摘 要: 通过对部分温州“城中村”村民分化考察, 发现社会网络以及嵌入其中的社会资本在村民上向或下向流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城中村“经济精英”生成也正是他们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互相转化的结果。城中村“政治精英”利用依附于旧体制的社会网络依然保持着配置各种资源的功能和资源转移通道的作用, 对“城中村”社会分化及分层起着关键性作用。

关键词: 城中村; 精英; 社会分层; 社会网络; 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7)05-0001-07

中国社会转型几十年来, 社会发生了巨大分化。社会分层和流动呈现了新的特征。陆学艺等认为当今中国由过去的三大社会群体分化为 10 个新阶层。静态地说明以职业分类为基础, 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 将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 10 个社会阶层^[1]。至于这些阶层形成的微观机制, 并没有给出说明。孙利平用总体性资本的概念动态地说明了当代一部分中国社会精英形成的过程^[2], 但不是概括全部精英的形成, 例如, 他没有说明新生的特别是“草根”企业家群体是怎样产生的。对东欧国家转型过程中精英阶层形成的研究中, 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撒列尼分别将其称之为精英循环理论和精英再生产理论^[3]。精英阶层的变化无疑成为转型时期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这些理论在学术界存在着明显的争论和跟进研究。而争论和分歧又多是建立在或多或少的经验研究的基础的不同结论。问题的关键是各自的经验研究的局限以及其结论的可适用的范围。比如, 经验资料收集的时间, 不同地区的差异等等。

任何社会现象都是一定社会情境的产物。本文试图以一个微观社会为背景, 考察该社区居民在十多年的社会分化中是如何发生的? 决定其流动的因素是什么? 特别是“精英”生成是否有其特殊原因。为此, 我选择了位于沿海开放前沿的温州市鹿城区城郊乡(现已撤并)所辖的 12 个城中村进行考察, 并深入其中一个村庄进行了田野调查。

一、城中村村民分化

这些村庄原先位于温州市城郊,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 村庄迅速被纳入城区, 大部分土地被征用, 剩余部分被村集体用来建成厂房、住宅或商用宾馆等, 为城中村带来不菲收入。温州本来就地少人多, 土地尤为紧张, 土地增值很快, 城中村的土地自然就成了奇货可居。这些村庄都有上亿的村集体资产将村民捆绑在一起。所以虽然行政隶属上已划归街道管理, 然而依然保持村的建制, 故被称为“城中村”^[4]。

收稿日期: 2007-01-08

作者简介: 王新(1968-), 女, 河南商丘人, 讲师,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制度社会学

温州是私营经济率先发展的地区。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该地区的私营经济已经露头,到80年代末已是红红火火。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农村实行人民公社体制,人民公社作为一级行政组织仅仅是国家意志的贯彻者,没有自身的独立利益。村民主体的生产、生活、交易等方面都受政府严格控制。该体制下,国家借用各种制度把村民附着在土地上,进行资源汲取。工农业产品在价格上的不平等交换成为国家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个人则是依附于国家并没有自身的独立利益,因而体现出相对平均、高度同质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以及村民自治等一系列制度在农村的实施,使村社区自治组织作为一个法人行动者,它在扮演国家代理人的同时,也充当着社区当家人,有着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自身利益。在利益的驱动下,温州农民复苏了深藏内心的工商业情结和对财富的欲望。由于所有制结构由国家所有制的单一模式转变为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存的多元模式,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为社会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中的权利和利益分化提供了前提条件,产业结构的多元化、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等,原先铁板一块的农民群体发生了明显分化。

因为这几个村都地处繁华市区,已经完全失去农业耕地,村民的职业因而也从第一产业转向了二、三产。一方面,他们享受集体资产带来的收益,另一方面,他们也在积极谋求自身发展。有的人开工厂,有的做贸易,有的跑运输,有的做中介,纷纷自谋生路。初期,由于钱好赚,村民忙于赚钱,并不关心集体的事。上世纪90年代末,钱越来越不好赚了,大多数村民回到了村庄,开始关心村集体资产。之后,村庄不再平静,几乎每个村都出现了村干部(时任村集体经济实体管理者)与村民的紧张对立。由于对村干部的不信任,12个村有10个村的干部或被村民罢免,或自行离职。

这些城中村的村民十多年前还是一样的农民,现在有的人工厂越做越大,成了有名的企业家;有的人却惨淡经营着一份小生意;有的成了“领薪者”;有的成了“食利者”;有的人开宝马车,住到了富人区;有的人却将房子都卖了,仅靠集体分红维生。村民们朴素地认为,那些“混”得好的人是有“本事”的人。而我更想知道“本事”具体是什么,特别是那些令普通村民难以望其项背的村庄“精英”阶层有着怎样的成长轨迹。这里的“精英”并没有严格定义,只是指那些拥有经济资本或组织资本大大超出一般村民且对村庄决策及村民心理有较大影响力的少数村庄成员。温州城中村的“精英”阶层有两类“精英”,分别是“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主要由私营企业家构成。“政治精英”则指村庄权力阶层,主要是各村的村支书、村主任(村集团董事长、总经理)以及处于村庄权力核心的有影响力的村干部。

二、“城中村”“精英”阶层

(一) 经济“精英”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随着经济结构由单一的公有制(国有和集体)经济结构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的转化,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在我国社会获得生成和发展,与此相适应便产生私营企业主群体。

开放初期,中国处于短缺经济。百业待兴,压抑许久的消费需求象火山一样喷发出来,生产什么都好卖,生产多少都卖得出去。巨大市场的开拓使得一时间温州涌出成千上万个家庭工厂,一家人,几台缝纫机就是一家服装加工厂;一间几平米的工棚加上一个车床,就是一个工厂;就是这样严格意义上算不上工厂的工厂生产出的商品质量可想而知。尽管如此,巨大的市场依然是

照单全收，因为当时全国大多数地区还被束缚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产品单一，销售渠道狭窄。地处城郊的农民自然不会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家里的地交给老人或妇女耕种，有的甚至撂荒，青壮年都投身于红红火火的“大生产”之中。以某村为例，仅有 400 多户人家的村子最多时出现了近百户“工厂”。他们的产品从服装、皮鞋到眼镜、打火机，从小五金到低压电器，产品不大，却占据了巨大的市场份额。只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竞争的日益残酷激烈，一些人被淘汰，一些人退出，还有一些人脱颖而出。依然是上面那个村，目前只剩下不到十家初具规模的工业企业，年销售额从几百万到几千万不等。经过 20 多年的大浪淘沙，他们就是当今时代被认为天之骄子的私营企业家阶层。

我在某村调查时，经过村支书的协助联系，采访了蔡某某，他的经历就很可能说明这一切。他现年 56 岁，早年，家庭贫困，长期营养不良，导致身体孱弱，因此难以胜任田间劳动。但他有一双灵巧的手和一付精敏的头脑，学会了缝纫手艺，在家做一些加工的小活。开始是贴补家用，随着政策放活，他扩大生产规模，开办了属于自己的服装厂，产品主要销往北京乃至全国各地。1989 年，一方面受北京学潮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当时对私营企业姓资姓社讨论的影响，市场波动剧烈等种种原因，他就在这一年遭到灭顶之灾，输得血本无归。他是个性格坚韧，不怕失败的人，借着邓小平南巡讲话，南方市场经济进一步开放搞活的东风，他又一次想从头开始。但当时他苦于没有资金，而此时市场准入门槛已抬高，以他当时的情况向国有银行贷款根本无望。向农村信用社贷款需要担保，他想到了村集体资产为他担保。他是如何得到当时的村书记和村长的答应，我们不得而知（而这恰恰是关键），他只是说在村长等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下，他重新选择了比服装行业竞争相对小，市场需求旺的建筑五金行业。目前他的企业年销售额 4 000 万元左右，产品销往东南亚和欧洲。他领我参观他的样品间时，抚摩着质量精致，外观高档的产品就象抚摩着他的孩子，充满了骄傲和自豪。为了使企业上档次上规模，更好地规避风险，他又与温州另几家企业强强联合，组建了集团公司。指着省委书记接见他时拍摄的照片，他的脸上流露出的同样是骄傲和自豪。

温州是私营经济的发源地，目前，全市现有个体工商户 22 万户，民营企业 13 万多家，其中企业集团 180 多家，跻身中国企业 500 强的有 4 家，跻身全国民营企业 500 强的有 33 家。民营企业数量、工业产值、上交税收、外贸出口、从业人员，分别占全市的 99%、96%、75%、95%、80%^[5]。温州早期企业家大多数是草根出生，不可否认，他们身上特有的企业家特质是他们超越常人，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但他们的资本积累是在政府、银行缺位情况下完成的。他们是如何实现资本积累，这对于发现他们发展轨迹是至关重要的。

（二）政治“精英”

他们是农村党组织或村委会的主要成员，是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组织和管理者。自我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很多地方农村党组织涣散，动员群众的能力已大大减弱。在集体经济不发达的乡村，某些村干部的工资是由村民分摊，村干部成了“乞讨者”。

不过在我调查的温州这 12 个村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各个村的集体资产少则近亿，多则数亿。雄厚的集体资产不仅能够负担村干部的工资，还能给村民提供医疗、养老补贴及儿童教育福利待遇。以某村为例，村资产 2 亿，2003 年村集体收入 600 多万元，其中用于村干部工资 100 万元。该村有干部及工作人员约 20 名。而另一村的村级管理人员 60 余人，即除了老人（60 岁以上）、孩子、妇女，每人都有一份工作，月工资在 3 千~4 千不等。当然，两委成员工资往往高于

他们。

在推行村民自治之前,农村基层权威结构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自上而下的授权,二是“党政不分”。

一般而言,党支部书记是一把手,党支部副书记或支委任村委会主任(大队长),重要决策一般通过两委会联合会议的方式做出。作为村庄一把手的党支部书记名义上是由村庄的党员选举产生的,但实际上乡镇党委的意志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村民组织法》的正式颁布实施后,村庄权力体系分化为自上而下的以党支部为代表的体制性权力和自下而上的以村委会为代表的内生性权力两大阵营,产生了村支书与村主任对立和矛盾的导火索。在经济发达特别是土地增值快的村庄,经济资源多,公共事物多,当村干部能带来更大收益,利益驱动下,村支书和村主任对村庄权力都表现出了更大积极性。于是会在村民选举过程中,采取多种手段,动员、收买村民,开展拉票、买票活动,欲通过各种手段进入村级政权。

“城中村”能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村长)的,无论村民拥护不拥护他们,不可否认他们都是村里的“能人”或“精英”。众所周知,在改革前的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中,政治资本是所有资本的核心,其他的资本形式基本都是政治资本的附属物。因此,村党支部书记往往掌控基层组织政治资本。

农村税制改革后,乡镇的工作重点转到了经济建设上来。以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衡量工作业绩的基本标准,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各村不惜以“将政策用足,打政策的擦边球”等方式为自己谋求更多的自由政治空间,以将变通普遍化和常规化作为一种正当的体制运作方式为自己的集团利益服务。村干部不是将自己应该担负的行政管理事务看作自己的主业,而是将经济活动看作是自己的主业。

随着改革逐渐深入,市场经济的完善,经济资本的地位逐步上升,渐渐成为占支配地位的资本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资本向经济资本能否顺利转化,就成为影响精英形成的一个关键因素。村支书、村主任通过担任村级集团的董事长、总经理直接参与到了经济领域。实现了政治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经过长期在村庄的经营,他们已成为一个掌握村庄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

随着村民的分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村精英集团的地位受到了挑战。多个村出现村民“聚众闹事”要求“罢免村官”均是在一些不安分的村民(体制外“精英”)带领下,抓住村干部的某些过失,如村级财务不清、村干部贪污腐败等问题,有意放大,制造氛围,使村民对他们失去信任感,进而鼓动村民造成混乱,以引起上级部门的干预。在我们调查的村庄,几乎每个村主要干部都经历过的被村民误解,被地痞恐吓,被组织调查等一系列问题。总体而言,干群关系紧张,彼此缺乏信任感是普遍现象。而往往这些体制外“精英”一旦成功,成为体制内“精英”,他们又会遭到同样的不信任和攻击。我调查的8个拥有村级集团的村庄,近些年来,有6个村处于混乱和瘫痪状态,有的集团领导人被判刑;有的开除党籍,被撤职;有的被罢免;也有主动辞职的,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经济问题是普遍而又致命的原因。

这固然与基层干部素质低下,地方政府领导不力有关,但是制度上的缺陷可能是更为根本的原因。村干部夹在上级政府与村民之间,既是政府的代理人,又是自治组织的当家人,总想两头不得罪,而结果往往是两边都吃力不讨好。据鹿城区纪检监察信息2000年11月1日统计披露,鹿城区占用农民劳力安置房、联建房指标,低价购房问题共涉及3个乡镇14个村,除城郊乡的黎

一村、巽山村外，被占用的农民劳力安置房、联建房共 331 套，计建筑面积 27 015.56 平方米。而这些房是为了与各实权单位如乡信用社、工商所、税务所等“搞好关系”，送给这些部门和个人的“关系”。当然结果是引起群众的极为不满。

村干部在对集体资产的经营运作中，由于缺乏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企业管理的经验，造成资产流失，这在私人企业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但在村集体企业经营中，出现集体资产大量流失，村民不会简单的认为只是由于管理不善，因为村民社会是熟人社会，缺乏监督性组织但不缺乏监督的“眼睛”。村民们一方面看到集体资产流失，另一方面又看到村支书家的房子造的是极尽奢华，村长的儿子的工厂红红火火，其中是否有内在联系，这是自然的想法。有些村的村民还真的找出了蛛丝马迹，揪出了腐化堕落分子。根据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担任公职的有理性的自私的经济人，面临诱惑必须在若干取舍面前进行选择时，他们将更愿意选择那种能为自己带来较多好处的方法^[6]。由于制度缺失或不完善，村干部既没有约束也没有保障，就难免有“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的嫌疑。

目前，随着城中村资产量化和股份制改造，村民运用村民组织法，对属于自己的集体资产进行严密监管，从而使得从前对村集体财产和集体事务有着绝对控制权的“政治精英”集团瓦解。新上任的村干部也吸取前任的教训，更加民主，更加稳妥地配合政府进行城中村改制。

三、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考察“精英”生成的一个视角

当问到村民如何看两类已渐渐远离村民视线的“精英”时，有的村民羡慕、佩服；有的红眼、不屑；有的怀疑、猜忌；有的则说：如果村里肯给我贷款，我的工厂也能做大。在某村调查中也发现，村庄中的“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大多关系密切；另有一村，监察部门的调查也反映出类似问题。这里面到底有着怎样的内在逻辑呢？

一般而言，影响社会分层的因素无非是两方面：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宏观因素主要指历史、制度、市场化程度、社会公正环境以及文化等非个人因素。微观因素则指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父子代际关系、个人价值取向等与个人相关的因素。在不同社会中，导致不同个体的上向或下向流动的因素是有差别的，要具体分析。

在政策、环境和历史机遇等宏观因素基本相同的情况下，起作用的必然是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父子代际关系、个人价值取向、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差异和运用情况。而城中村村民的受教育程度差别不大，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也十分接近，因而可以推断，城中村社会分层，尤其是精英早期资本积累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社会资本。通过对城中村实证考察也证实了这一点。

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通过“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的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这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是与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获得这种会员身份就为个体赢得声望，并进而为获得物质的或象征的利益提供了保证。个人社会资本的多少取决与两个因素：网络规模和网络成员的社会资源状况^[7]。在科尔曼看来，由于某些行动者的利益部分或全部处于其他行动者的控制之下，行动者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相互进行各种交换，甚至单方转让对资源的控制，其结果就形成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这种持久存在的社会关系，不仅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同时是一种个人资源^[8]。波提斯进一步指出社会资本是个人依赖网络或更大的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调配稀缺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依赖于个人，而是依赖于个人与他人的关系，社会资本是嵌入性的产物^[9]。林南在其社会资源理论中将社会资源定义为“财富、地位、权力和与个人有直

接或间接联系的那些人的社会关系”，他把社会结构想象为按照某种规范的荣誉和报酬而分等的人构成的社会网络，社会结构呈现金字塔型，在同一等级中，接近和控制荣誉和报酬的机会相似，他们之间的联系是强关系；不同等级拥有接近和控制荣誉和报酬的机会就不同，他们之间往往是弱关系。而弱关系却将不同等级拥有不同资源的人联系在一起，并且，它的作用不仅仅是信息的沟通，资源的交换也是通过它进行的。那么，城中村存在怎样的社会网络？各阶层在网络中如何分布？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资源又是怎样交换的？等等问题需要对城中村做进一步考察。

在所有城中村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村民组织法颁布以前），村支书都居于村级组织的权力顶峰，掌握着村委会主任等其他村干部的决定权，在村级组织所有职能中发挥着核心领导作用，拥有村委会一切重大事务的决策权。

农村社会是典型的传统社会，尽管今天，中国社会已发生很大变化，但中国人在社会行为中依然依赖亲情、熟悉、血缘等关系，人治往往重于法制、规治，村支书因而作用很大，常常以村庄“家长”自诩。村党组织在发展党员时，出于种种考虑，村支书将自己的亲信或亲戚网罗进村党支部已成为了不争的事实，久而久之，在村党员队伍中就形成了以宗族、好友关系为主线的“关系网”，无论下一任书记是谁，大家的利益都不会受损。温州市监察部门调查的某村，村民在提出罢免前村委会干部时指控的八位干部，其中前任书记 H 某是现任（罢免前）村长兼副书记 N 某的岳父，书记 C 某是 N 某媳妇的舅舅，副村长兼支部委员 F 某是 N 某的同学和朋友，出纳 E 某是前任书记 H 某的侄媳妇。在另一个村，当我把村里的十多位经济“精英”排列出来，村民告诉我，这里有村支书的儿子，村主任的兄弟，其他的多是和村支书或村其他干部关系密切的人。因为有这一层关系，他们能优先使用村集体所有的厂房，还能得到村集体资产担保的贷款，企业就能作大作强。而他们之间就形成了以村干部为核心的关系网，在这个网络中，各种资源得以交换、流转、涉取。

一般而言，农民转化为市民，从务农转变为务工经商，意味着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网络从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转变为以业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然而，由于“城中村”的相对封闭性，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村民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网络。从上两个案例可以清晰地看到基于对血缘、地缘关系的依赖而形构的社会网络的存在。在这样的社会网络中，拥有总体性资源的“精英”集团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必然会选择与他们存在“强关系”的亲戚、朋友以及利益共同体中的成员，因为信任可以节约交易成本。“强关系”群体能够给群体内成员带来利益的同时，却会阻碍其他人获得这种利益。有时群体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却牺牲了其他人的利益。那么，“强网”又是怎样在网内资源流动的同时限制外来者的呢？这可以用结构洞理论给予解释。

所谓结构洞，是社会网络的两种类型中的一种，即社会网络中的某个或某些个体和有些个体发生直接联系，但与其他个体不发生直接联系。无直接或关系间断的现象，从网络整体看好象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10]。在结构洞存在的时候，处于两者连接状态的第三者拥有两种优势：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相对于其他两个人，这个行动者具有明显的优势，他处于中心位置，可能接近网络中的所有资源，另两个行动者则必须通过他才能与对方发生联系，而为了保持这两种优势，第三者希望保持着结构洞的存在，不会轻易的让另外两者轻易获得，这样，他就成为渔翁得利者，通过占据两个没有联系的行动者之间的中心位置——结构空洞——而获利。

在城中村的社会结构网络中，存在大量的结构洞。村庄资源及其管理集中于村干部手中，村民无法获得相关信息，村民与村干部的信息交流通常是单向的。这样，村民之间就存在大量结构

洞,村干部拥有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使他们决定资源的走向。这就是为什么等村集体资产大量流失后,只有当上级介入调查以后,村民才能知道实情,而无法作到防患于未然。随着村民民主意识的提高,村级管理的公开透明,各类制度的健全完善,信息渠道的畅通,结构洞被弥和,此类问题就会得到有效改善。

参考文献

- [1]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2002. 8.
- [2] 孙利平. 总体性资本与转型期精英形成[J]. 浙江学刊, 2002, (3): 100-106.
- [3] Ivan S. Social Inequalities Under State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1978, 1(2): 61-87.
- [4] 王新. 解读温州“城中村”现象[J]. 温州大学学报, 2005, (1): 21-27.
- [5] 温州经济贸易委员会. 温州工业概括[EB/OL]. <http://wzjmw.wenzhou.gov.cn/wzjmw/wzjm/wzgygk/index.html>
- [6] 詹姆斯·M·布坎南(刘军宁, 王焱, 贺卫方译). 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6. 336-337.
- [7] 林南(张磊译). 社会资本: 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理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43.
- [8] 詹姆斯·科尔曼(邓方译). 社会理论的基础(上)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0. 330-354.
- [9] Alejandro P. Economic Sociology and the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A Conceptual Overview, in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essays on network eth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M]. New York: Russell Sage, 1995. 12-13.
- [10] Ronald B.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45-49.

A Micro-perspective on the Elites Formation in the Village-in-city of Wenzhou

WANG Xin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Abstract: Through investigating “village-in-a-city” of Wenzhou, the paper found that the social network and social capital are the key elements determining the up or down mobility of its resident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The formation of the elites (new entrepreneurs) of the “village-in-a-city” is just the result of the exchange between the social network and social capital, which accounts for the fact that the social network embedded in the old system still functions in distribution of various sources, by which the so-called political elites play crucial roles in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the “village-in-a-city”.

Key words: “Village-in-a-city”; Elite; Stratification; Social-network; Social capital

(编辑: 李颖)